

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三项突破

王满生¹, 谷声燕²

(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法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3; 2. 江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是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以审判为中心的内涵体现为侦、诉、审关系上以审判权为中心;事实认定上以庭审为中心;定罪量刑上以法官为中心。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最紧迫的是落实刑事辩护权利,改善刑事辩护生态,实现刑事辩护的有效化和普遍化,最直接的是通过刑事庭审的实质化真正发挥庭审在整个诉讼过程中的作用,并最终促进公安、检察、审判三者关系的深度调整,形成合理的侦、诉、审关系,实现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预期目标。

关键词: 审判中心;庭审实质化;律师辩护;侦诉审关系

中图分类号: D915.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9)03-0100-08

Three Breakthroughs in the Trial – centered Litigation System Reform

WANG Mansheng¹, GU Shengyan²

(1. School of Law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Hubei 430073;

2. School of Marxism,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22, China)

Abstract: The trial – centered litigation system reform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judicial system reform. The connotations of the trial – centered system are embodied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vestigation, prosecution and trial centered on judicial power; fact recognition is centered on the court trial; judge – centered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 The trial – centered litigation system reform is a systematic project. The most urgent is to implement the criminal defense right, improve the criminal defense ecology, and achieving the effectiveness and universalization of criminal defense. The most direct is to truly play the role of the trial in the entire litigation process through the substantialization of the criminal trial, and ultimately promote the deep adjust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security, procuratorial and trial, and achieve the expected goal of trial – centered litigation system reform.

Key words: trial – centered; substantialization of court trial; lawyer defense; investigation – prosecution – trial relationship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

收稿日期: 2018 – 09 – 1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刑事诉讼中程序事实证明问题研究”(编号: 12CFX054); 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青年项目“大学生法治思维现状与培养研究”(编号: 16KS13)

作者简介: 王满生(1973 –), 男, 江西遂川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后, 江西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诉讼法学、证据法学。

谷声燕(1981 –), 女, 重庆铜梁人, 江西师范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

障”,“必须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严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审查、运用证据,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规定》明确了诉讼改革的方向,为进一步推进严格司法、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提供了制度化保证。如何理解以审判为中心的深刻内涵,准确把握中央精神,事关我国诉讼制度改革甚至是司法体制改革的成败,“是当前和今后一个很长时期内必须要解决的理论和实践课题”。^[1]本文从“审判为中心”的内涵着手,提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需要在三个方面取得突破和实效,即必须实现庭审的实质化,保证法官独立裁判;保障律师有效辩护,真正发挥律师在刑事案件中的应有作用;进一步调整侦查、起诉、审判的关系,形成合理的诉讼构造。

一、“以审判为中心”的基本内涵

如何理解“以审判为中心”,是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首要前提。《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发表后,很多专家学者和实务界同志对此发表了很多看法,但是对此理解不尽一致。第一种观点为审判标准中心说,认为以审判为中心就是以审判的标准为中心,要求侦查、审查起诉都要依审判的标准为标准。“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实际上是要实行以司法审判标准为中心。也就是说,从刑事诉讼的源头开始,就应当统一按照能经得起控辩双方质证辩论、经得起审判特别是庭审标准的检验,依法开展调查取证、公诉指控等诉讼活动,从而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1]“以审判为中心就是以庭审作为整个诉讼的中心环节,侦查、起诉等审前程序都是开启审判程序的准备阶段,侦查、起诉活动都是围绕审判中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的标准和要求而展开,法官直接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依据证据裁判规则作出裁判。”^[2]可以说,这种观点代表了实务界的主要观点,审判标准说得到了一些学者的支持,樊崇义教授认为,“以审判为中心,是在我国宪法规定的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前提下,诉讼各个阶段都要以法院的庭审和裁决关于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要求和标准进行,确保案件质量,防止错案的发生”。^[3]第二种观点是审判活动中心说,认为“以审判为中心”就是“以审判活动为中心”,吉林大学闵春雷教授认为“以审判为中心应该理解为以审判活动为中心,而不是以审判权、法官或者以审判阶段为中心。审判活动即是在中立的法官主持下,通过庭审的举证、质证及认证等环节认定案件事实、判定被告人的实体权益及重大程序争议等活动”。^[4]学术界持该种观点的学者不少,认为“以审判为中心,就是以审判活动为中心,而非以法官、法院或者审判权为中心,也绝非要在司法改革中为法院扩权”。^[5]第三种观点为审判权中心说,徐静村教授认为,“实行以审判为中心必须重新构建侦、诉、审三者的关系,重点是侦诉关系和诉审关系,侦诉关系中检察权属于上位,侦查权属于下位,诉审关系中审判是中心,诉审关系以确保法院和法官的中立裁判地位和真正依据案件真实严格依法公正裁判为目的”。持相同观点的还有陈卫东教授,“以审判为中心作为对三机关现状的反思,实际上是要摆正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关系,其核心在于构建一个以审判为中心的科学、合理的诉讼构造。”^[6]第四种观点为多维角度说,陈光中教授认为“审判中心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理解。第一,审判中心是从最终认定被告人是否有罪这一权力由人民法院行使的角度上来讲的;第二,审判中心要求庭审实质化并起决定性作用;第三,审判中心意味着侦查、起诉、审判阶段为审判作准备,其对于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标准应该参照适用审判的标准。”^[7]可以说,对于“以审判为中心”的观点众说纷纭,学界还没有形成共识。笔者以为,“以审判为中心的提出”是针对中国现有的侦查中心主义和过于依赖书面审理模式而言的,其目的是为了司法公正。从背景上看,首先以审判为中心无法回避侦诉审三者的关系,以审判为中心强调侦查和起诉只是审判阶段的准备,要突出审判权对侦查权和起诉权的影响和制约。第二,以审判为中心是针对卷宗中心主义而言的,一直以来,我国刑事庭审的方式主要依赖于卷宗,法庭审理过程中证人出庭率极低,庭审过程走过场,庭审质证

虚化,以审判为中心就是要做实庭审,强调事实认定在法庭。第三,以审判为中心强调的是定罪量刑在法庭,实际上是实现“以庭审法官为中心”。强调定罪量刑在法庭也是针对我国刑事审判背景来说的,长期以来,我国刑事案件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现象比较突出,“刑事庭审裁判虚化”。^[8]所以笔者认为:以审判为中心的内涵体现为三个方面,在侦、诉、审关系上体现为以审判权为中心;在事实认定上体现为以庭审为中心;在定罪量刑上体现为以法官为中心。基于此,笔者认为在理顺侦诉审关系、实现刑事庭审的实质化、促进律师辩护的普遍化有效化等方面进行改革并取得实效、取得突破,才能实现“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目标。

二、以审判为中心最直接的是要实现庭审实质化

“审判中心主义的实质是审判的实质化。”^[9]以审判为中心就是要求整个刑事诉讼行为都要以审判为重心,所有司法机关和人员都要以审判为目的,整个刑事诉讼活动都要以审判为决定性环节,审判对案件的调查具有实质性意义。侦查机关调查收集证据,检察机关审查提出证据都是为审判作好准备,证据合法有效需要人民法院通过庭审认证质证,“未经人民法院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为有罪”。强调以审判为中心就是要突出庭审的功能与作用,特别是突出一审庭审的作用,要将庭审作为事实认定、证据认定的决定性环节。要求事实认定在庭审,判决结果形成于庭审,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要着力解决庭审的形式化和虚置问题。确立刑事审判作为全部刑事诉讼的中心,既是严格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的要求,也是实现依法治国的重要举措。其措施主要有如下方面:

进一步落实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是推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10]《决定》强调,“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出庭率低一直是我国刑事诉讼中亟待解决的问题,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于出庭制度作了较大的修改,对证人提出了强制出庭的要求,但是证人出庭并没有明显改观。“目前证人出庭率非常低,证人基本上不出庭,直言词原则远没有得到贯彻,被告人的质证权无从保障。”^[11]但是证人出庭作证问题是落实庭审实质化的前提,没有证人作证谈何庭审实质化。由于侦查卷宗记载的是一种相对固定的信息,而证人出庭作证却是一种活生生的信息,通过证人的作证活动,法官不仅可以通过语言还可以通过声音、神态等方式判断证言的真实性。“推进庭审的实质化,必须高度重视解决这一问题,着力提升证人、鉴定人出庭率。”^[11]所以,进一步强化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既是解决突出强化庭审的需要,也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规律的要求,同时为司法公正的实现提供了制度化保证。

要严格实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防止冤假错案发生,切实提高司法公信力。司法实践证明,非法证据特别是非法言词证据不仅仅侵犯被告人人权,更可能造成冤假错案,损害司法公信力。近年来的杜培武案、余祥林案都是因为未遵循证据收集的法定程序,通过获取并采纳非法口供而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非法证据排除是发挥庭审程序制约作用、推进庭审中心的重要环节,应将非法证据排除作为庭审的重要组成部分,贯彻非法证据排除。”^[12]2010年我国颁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正式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现以审判为中心就是要严格实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改变那种审判机关对侦查机关证据照单全收的做法,遵循审判规律,切实贯彻证据裁判规则,依法阻断非法证据进入庭审,有效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

强化合议庭和主审法官的职能,逐步贯彻直言词原则。要实现以审判为中心,就要“在法庭审判阶段,始终保持着一种包括控辩审三方在内的正三角结构,并且在全面贯彻直言词、中立、公开、对等辩论等原则的基础上展开对证据的审查判断活动”。^[13]直言词原则是指直接审理原则和言词审理原则。直接审理原则要求法官、检察官、被告人、诉讼当事人都必须亲自到庭出席审判,法官必须直接调查和采纳证据。言词审理是指诉讼各方都要以言词方式从事审理、攻击和防御。直言词原则突出强调了法官在证据审查判断上的权威,是以审判为中心原则在证据法上的体现。“直言词原则既是一项

调整诉讼程序的基本原则,又是调整诉讼证明活动的基本原则之一。”^{[14] (p168)} 现阶段我国刑事诉讼实践中,直接原则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这既与我国法院实际上行政化运行机制有关,也与我国庭审构造、整个诉讼文化相关。要想实现直接言词原则,首先要改变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状况,必须发挥合议庭和主审法官的职能。《规定》强调“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就需要进一步强化主审法官和合议庭的职权责。要选拔政治素质好、办案能力强、专业化水平高、司法经验丰富的审判人员担任主审法官,作为独任法官或者合议庭中的审判长。“庭审功能的强化与合议庭及主审法官责任的强化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应当进一步明确合议庭作为基本审判单位的功能、权力与责任,当前合议庭的功能只能强化,不能削弱。”^[15]

要确立庭审的主导功能,逐步削弱法官对庭下阅卷的依赖。2012年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全案移送制度。“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并将案卷材料、证据移送人民法院。”由于检察院在审查起诉阶段将所有案卷材料都已移送至人民法院,为法官庭前阅卷和庭后阅卷提供了便利,更有可能导致依赖卷宗而虚化庭审。根据证据裁判的原则,凡是未经庭审质证的证据都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而庭下阅卷有可能导致更多未经庭审质证的证据影响法官心证,这些证据信息经过了侦查人员的加工与取舍,很可能导致信息的遗漏,从而形成误判。但是由于庭审时间短暂,卷宗的全面充分信息可以弥补法庭审判的不足,同时“防范庭审举证的片面与局限,以及延伸对案件审查思考空间,还有积极作用”。^[15]所以在现阶段整个庭审构造没有大变的情形下,不能将庭审绝对化,排斥法官的庭后阅卷,而是要发挥庭审的主导性作用,庭后阅卷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性功能,以辅助、检查法官的判断以形成心证,但决不可将阅卷代替庭审,要不断削弱对庭下阅卷的依赖。随着以审判为中心司法改革的逐步推进,我国庭审构造的变化,控辩双方对抗性的增强,最终将彻底杜绝庭下阅卷,真正实现证据裁判在法庭,定罪量刑在法庭。

三、以审判为中心最紧迫的是要实现律师辩护的有效化和普遍化

现代刑事诉讼以控辩平衡、控审分离为原则,辩护作为刑事诉讼的一极发挥着重要作用。辩护律师的参与可以产生以权利制约权力和以程序制约权力的效果。“西方法治国家将被追诉人的辩护权及其获得辩护律师的权利上升为宪法原则,并将其作为刑事诉讼的指导理念和最高原则。”^{[16] (p319-320)} 虽然说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十分重要,但是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律师辩护十分不正常,主要体现为律师辩护率低、辩护质量不高、辩护方与司法机关的关系不正常。

首先,刑事辩护率低、辩护质量不高一直是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普遍现象。可以说这不是中国某一地方的问题,也不是某一阶段的问题,而是长期的问题,可以说是一个制度性问题。从市场经济建设之初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的刑事辩护一直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刑事辩护率基本维持在20%以下。个案的调查也基本印证了我国刑事辩护率在20%以下的判断。“D县刑事审判中,自行辩护率很高,而律师辩护率相当低。在律师辩护中,委托辩护率略高于指定辩护。在2007年、2008年,686名被告人中,自我辩护率约占77%,而律师辩护仅为22%;在律师辩护中,委托辩护和指定辩护分别占14%和8%。”^[17]即便在如此有限的律师参与刑事辩护中,律师的辩护质量也十分堪忧。更多的律师基本上不调查取证,不认真研究案卷,在庭审中仅仅发表一些无关痛痒的言论,没有提供有价值的意见供法官参考,其辩护几乎不会对案件结果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不论是司法机关还是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对于律师的辩护质量评价普遍较低。

其次,辩护律师与司法机关不能形成理性关系,正常的辩护行为难以履行。辩护律师无法与司法机关形成理性关系主要是指审前的辩诉关系和审判中的辩审关系不理性,不符合现代法治理念。辩诉关系不正常首先是因为律师的辩护权利无法得到有效保证,律师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即使是2012年刑事诉讼法颁布以后,辩护律师的辩护权利还是未能得到根本的变化,实现起来十分困难。律师在侦查

阶段会见难,主要体现在司法机关恶意曲解法律和适用法律规则,对于特别重大贿赂案件中规定的三种案件情形往往作出有利于自己办案的解释,对于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需要侦查机关批准的案件也随意作出解释,同时增加限制条件变相限制辩护律师的会见权。^[18]阅卷权也受到限制,限制阅卷权的方式主要是律师复印费价格过高,有的检察院对于复印和拍照只能选择其一,有的阅卷需要预约排队现象严重。检察机关办案人员在内心深处还是限制律师阅卷,这样导致律师的阅卷权行使有限。对于调查取证权,律师一般都不会行使,因为调查取证的风险太大,调查取证导致律师没有人格尊严,也没有基本的安全感。^[19]即使发现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往往也是委托司法机关进行调查取证。即使是在审判阶段,应该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居中裁判的法院也与辩护律师关系紧张,法院驱赶律师出法庭的现象越来越多,甚至有越演越烈之势。由于辩护律师与法庭的紧张关系导致律师不能很好地行使辩护权,法院对于辩护律师提出的辩护意见也难以足够重视,最后导致被告人的利益没有得到很好的维护。从表面上看个案的审理更加趋向案卷化,法官必须花大量的时间阅卷才能定案,导致案卷判决违背事实的风险增加。“从长远来看,辩审冲突的发生不仅会影响司法权威,还会导致法院内部加强对法官的监督从而加剧司法行政化倾向,最终还可能会影响审判的中心地位。”^[20]从深层次上看,缺乏有效的律师辩护将使法院的居中裁判职能更难以发挥,危及司法的公信力。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就是要发挥辩护律师的应有作用,就是要辩审、辩诉、辩侦关系的理性化,就是要以审判阶段对定罪量刑的要求为标准,以对证据采信质证的标准进行诉讼活动,保证辩护律师的合法辩护,保证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保证审判权的依法行使。为了更好地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最为迫切的就是落实律师权利,逐步实现有效辩护和普遍辩护。合理解释与修正刑法关于辩护权的条款,落实与完善辩护人的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于三权已经作了理性务实的规定,现阶段就是要合理解释和落实法律规定。侦查机关要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办案人员利用职权阻止律师会见当事人,对于一般案件看守所要实现48小时内安排律师会见到自己的当事人,对于贪污贿赂重大复杂案件应该实现律师在5天内见到自己的当事人。同时要防止侦查机关以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为借口,阻止律师会见当事人。要保证律师会见自己当事人时有足够充分的时间进行交流,应该采取措施充分保证律师会见的秘密性。对于律师会见的秘密受到保护,还应保障“在律师会见被追诉人后,侦查机关不能要求被追诉人或者辩护人透露交流的内容”。^[21]同时检察机关还应采取人性化措施降低阅卷的成本,提供律师阅卷的场所和必要设施,不限制律师的阅卷时间和阅卷次数,保证律师阅卷权的充分实现。而三权中最难以实现的是调查取证权,我国法律一方面规定律师可以进行调查取证,但另一方面又要求得到被取证人和单位的同意,这就导致在实践中律师调查限于纯粹的民间调查,法律规定与实践运行相悖。鉴于此,笔者认为需要修改法律,赋予律师具有一定的强制调查权,以解决我国刑事律师无法调查取证的状况,同时要加强法律援助制度的建设,实施值班律师计划,促进刑事案件辩护的有效化和普遍化。

四、以审判为中心最核心的是要形成合理的侦、诉、审关系

以审判为中心必然会涉及司法职权的分配,涉及公检法三机关权力关系的重新审视,甚至很多学者认为以审判为中心后就必然废除现有公检法三机关关系。长期以来,“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饱受争议,反对该观点的学者认为,该原则违背了刑事诉讼中分权的基本原则,不符合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酿成了我国司法改革的一杯杯苦酒。^[22]有学者认为“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中的“配合原则”负面价值太大,主要体现在“配合原则严重影响了法院的依法独立审判原则;违背了国际通行的控审分离、无罪推定、平等对抗的原则;配合原则使被告最重要的诉讼权利——辩护权难以有效行使,容易产生冤假错案;配合原则削弱了制约原则的作用,容易使三机关之间的相互监督流于形式,容易形成对审判机关的巨大压力,不利于发挥司法机关的人权保障机能”,^[23]对于配合的规定应该予以废除。支持“分工负责、互相配合、相互制约”原则的学者认为,该原则是一项符合中国国情的司法制度,

“从总体上看,公检法三家的配合制约关系是符合司法规律和实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具有彻底的人民性、最普遍的公平性、最有效的协调性,我国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职责分工体现了最有协调性,其制度本身具有正当性,能够保障实现最普遍的公平公正,也能够促进司法资源的节约”。^[24] (p233) 由于角度不同得出了两种彻底不同的结论,支持的观点站在历史角度上,将“分工负责、互相配合、相互制约”看成是我国长期司法实践生成的一项制度,是中国一项特色司法制度。而反对的观点是站在西方法治主义的立场之上,用西方的法治理论工具来单项分析该原则。从历史上看,“分工负责、互相制约、互相配合”之所以写进宪法,实际上是历史教训的总结,其形成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与现实性。在新中国的国家机关体系中,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三机关的职能有所分工,但是三机关的工作任务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武器。由于新中国阶级斗争形势的要求,三机关强调配合为主,是当时完成三反五反任务的要求。到了中共八大时期,刘少奇同志在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明确地强调了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在工作中要互相配合、相互制约。但是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之后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公检法三机关抛弃了分工负责、相互制约的原则,实行“一长代三长、一员顶三员”的做法。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一次规定了“分工负责、相互制约、互相配合”关系,并在1982年宪法中予以明确规定。该原则在法律中予以规定,“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文革期间无法无天沉痛教训的深刻反思和弥补。三机关缺乏制度逻辑的制约关系,相互关系的紊乱使得司法制度成为政治运动的工具和代价”。^[25] 从我国刑事诉讼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分工负责、相互制约、互相配合”原则从1953年党的文件中最初出现,到上升为刑事诉讼法甚至是宪法的条款,^[25] 经历了近三十年的时间。应当说该原则上升为法律是慎重的,是我国法治发展几十年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符合我国对于国家司法机关权力架构的历史事实,是对我国侦查权、审判权、检察权定位的合理反映。如果不看清这项原则的历史脉络就无法正确地理解该项原则,“所有法律的名目都是在历史之光的照耀下才能理解,它们都是从历史中获得促进力且必定会影响它们此后的发展”。^[26] (p32) 但该原则规定以后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很多问题,特别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提出以后,如何使“分工负责、互相制约、互相配合”原则与审判为中心的改革理念相一致。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理解:

要从强调配合向强调制约转向。一直以来,我国司法机关在贯彻“分工负责、互相制约、互相配合”过程中过于强调互相配合,而忽视了相互制约。这既是长期以来我国司法过程形成的惯性,也是司法工作人员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基本思维定势。毋庸置疑的是强调配合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起过重大的作用,对于集中打击犯罪实现社会的安定团结作用也不可忽视。但是理解互相配合应该是在制约前提下的互相配合,是在分工负责基础上的互相配合。实践中很多司法人员把强调配合异化为失去原则的配合,失去法律底线的配合。检察机关对于公安机关移送的不符合起诉条件案件退回侦查,在侦查终结不符合起诉条件时也勉强起诉,法院对于无法形成内心确信的案件也不直接作出无罪处理,而是通知检察院撤回案件,有的案件甚至长期不根据法律诉讼期间处理从而导致超期羁押。实际上这种做法本身不是因为法律有“分工负责、互相制约、互相配合”原则的规定而导致的,而是司法人员没有遵循法治规律,没有根据法律规定,是法治虚无主义在司法实践中的体现,是司法人员“权力思维”和“打击思维”在作怪。陈光中教授认为“这种成为潜规则的配合违反了法律的规定,违背了刑事诉讼程序依次向前推进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可以倒流的运作规律,影响了诉讼效率,损害了司法公正和人权保障。为此,必须实质性地坚持法定程序,纠正这种无原则的配合”。^[27] 贯彻好“分工负责、互相制约、互相配合”原则不仅仅需要纠正无原则的配合,更需要强化制约思维,要将法律所规定的相互制约落到实处。从现有我国刑事诉讼法律规定看,法院发挥对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制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依法严格实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是“建立审判权对侦查权的制约和引导机制,是审判中心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和重点内容”;^[28] 另一个方面就是坚决实现疑罪从无原则,对于检察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不得与检察机关进行审前沟通,坚持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标准,坚决实现疑罪有利于被告的原则。近年来,最高院通过平反冤假错案,通过个案的疑罪从无宣判形成了合理的导向,从而通过这种倒逼机制促进司法人

员尊重司法规律,更好地实现相互制约功能。

进一步理顺检察院与公安机关的关系。公安机关是我国的侦查机关,公安机关实行双重领导制度,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实行垂直领导机制。公安机关享有除逮捕之外的所有强制措施决定权,所有强制措施执行权,对侦查终结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对于检察机关不逮捕和不起诉决定的有权要求复议,还可以提请上级机关复核。检察机关对于公安机关的提请逮捕有批准权,对于移送审查起诉案件有权决定是否起诉,对于侦查过程的违法情形有监督权。但是由于我国公安发展的历史原因以及现阶段国家权力架构等多种因素,导致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难以对公安机关实行监督,对公安机关的制约也难以落到实处。对于检公关系,学者们提出了很多设想。有学者认为解决我国刑事诉讼中检公关系重要方式是实现检警一体化。^[29]同时还有很多学者提出了侦诉合一方案、双重领导模式或者一重领导一重监督方案;强化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监督制约机制模式;检察指导侦查方案等。^[30]笔者以为,在理顺侦查机关与起诉机关关系上,必须尊重我国司法机关职权形成的历史,必须“从我国实际出发,立足于人民检察院的宪法地位及其与公安机关的现有关系”,^[31]必须按照实事求是的方式解决法律问题。从这个原则出发,认为在中国进行检警一体化改造不符合实际,一是将公安机关的侦查权划入到检察院将使检察院的监督角色失去,从而增加行政化色彩,导致检察院的宪法定位不明确;二是公安机关的调动资源进行侦查的能力受到削弱,对于犯罪的打击和社会的防控不合适;三是将两者合一,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监督无法实现,导致侦查机关的一些违法行为无法纠正,从而增加法院对检察院的“审查”任重,这种改革将导致系统混乱,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合理的解决方案是,强化检察院与侦查机关在实质上的分工,对于一些重大疑难案件,可以建立“检察引导侦查”工作机制,“检察机关通过参与侦查机关对案件的侦查,对证据的收集、提取、保全及侦查取证方向,提出意见和建议,并对侦查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的工作机制”。^[32]其次是强化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制约机制,实践中必须克服两种倾向:一是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各行其是,只有分工,没有配合,也没有制约;另一种是检察院和公安机关配合过头,基本上没有制约。以审判为中心就是要求检察机关能够按照审判标准为要求,对侦查机关的侦查取证结果进行合法性审查,对于侦查过程中的违法渎职刑讯逼供行为进行制约,以维护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的利益。

法检关系中强调检察院监督的程序性和事后性。“法院和检察院关系作为我国司法机关的核心组成部分,既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实施和推进的关键节点。”^[33]法院和检察院的关系在我国比较特殊,一方面法院是审判机关,法院对于检察院提起的案件行使审判权,体现了法院的独立性与权威性;另一方面检察院又是法律监督机关,检察院对于法院的不当行为可以行使监督权。有学者从域外审判权的独立性和权威性论证我国检察权设置的不合理性,认为我国审判权没有应有的权威,前提就是要废除检察院的监督权。实际上,在司法实践中检察院启动监督权对法院行使监督情形不普遍,法院司法权威不高实际上是行政权等不同权力对法院审判权的干涉,并不是检察院的监督权所引起。在司法改革过程中,需要强调的是,检察院对法院的监督是宪法定位,检察院的监督要在维护司法权威的前提下进行,检察院不能在庭审过程中行使监督权,检察院认为庭审过程中的法官行为违法的,必须依据法定的程序在审理后提出,对于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行使必须是依据合法程序,同时也必须是遵循事后性原则。

逐步实现法院对公安机关的制约,促进从侦查中心转向审判中心。公安机关与法院之间,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其如何配合与制约的关系,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的侦查优势地位依赖的基础是侦查案卷移送制度,法院审判对公安机关的侦查卷宗形成高度依赖,而无法否定侦查卷宗的证据效力,从而导致法院失去了对公安机关的实质性制约,最终出现案件流程变为流水作业式,从而导致审判空心化。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要求逐步强调法院对侦查活动制约,发挥法院对侦查行为的影响与作用。从最终目标来看,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需要将强制侦查行为纳入司法审查范围。

“司法公正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人民群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要求。”^[34]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目的是推进司法公正,改革涉及司法职权配置、庭审构造、律师制度改革、庭前案件分流、司法去行政化地方化等等各个方面,可以说任重道远。但是以审判为中心是法治发展的趋向,也是评判法治水平的重要标准。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推进律师制度改革实现刑事辩护的有效化是一项紧迫的任务。通过刑事庭审实质化的改革促进公安、检察、审判三者关系的合理化是改革的核心。

参考文献:

- [1]沈德咏.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J].中国法学,2015(3):5-14.
- [2]王守安.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带来的深刻影响[N].检察日报,2014-11-10(3).
- [3]樊崇义.以审判为中心的概念、目标和实现路径[N].人民法院报,2015-01-14(5).
- [4]闵春雷.以审判为中心:内涵解读及实现路径[J].法律科学,2015(3):36.
- [5]徐静村.再论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正[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2):75.
- [6]陈卫东.以审判为中心推动诉讼制度改革[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03-31(A5).
- [7]陈光中,步洋洋.审判中心与相关制度改革初探[J].政法论坛,2015(3):121.
- [8]何家弘.刑事庭审虚化的实证研究[J].法学家,2011(6):128.
- [9]张建伟.审判中心主义的实质与表现[N].人民法院报,2014-06-20(5).
- [10]龙宗智.庭审实质化的路径与方法[J].法学研究,2015(5):142.
- [11]陈光中,魏晓娜.论我国司法体制的现代化改革[J].中国法学,2015(1):109.
- [12]耿慧茹.刑事诉讼应坚持庭审中心原则[N].人民日报,2014-12-29(7).
- [13]汪建成,孙远.刑事证据立法方向的转变[J].法学研究,2003(5):39.
- [14]沈德咏.刑事证据制度与理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 [15]龙宗智.论建立以一审庭审为中心的事实认定机制[J].中国法学,2010(2):153-154.
- [16]陈光中等.中国司法制度的基础理论问题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 [17]马静华.刑事辩护率形成机制研究——以刑事一审为中心[J].四川大学学报,2011(6):126.
- [18]韩旭.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律师辩护难问题实证研究——以S省为例的分析[J].法学论坛,2015(3):135.
- [19]陈瑞华.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三种模式[J].法商研究,2014(1):77.
- [20]王彪.刑事诉讼中的辩审冲突现象研究[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5(6):103.
- [21]汪海燕.合理解释:辩护权条款虚化和异化的防线[J].政法论坛,2012(6):27.
- [22]谢佑平,万毅.分工负责、互相配合、相互制约原则另论[J].法学论坛,2002(4):106.
- [23]聂洪勇.分工负责、互相配合、相互制约原则的检讨与重构.法律适用[J],2007(1):82-85.
- [24]沈德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论纲[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
- [25]韩大元,于文豪.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的宪法关系[J].法学研究,2011(3):12.
- [26][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 [27]陈光中.如何理顺刑事司法中的法检公关系[J].环球法律评论,2014(1):63.
- [28]詹建红,张威.我国侦查权的程序性控制[J].法学研究,2015(3):156.
- [29]陈卫东,郝银钟.侦检一体化模式研究——兼论我国刑事司法体制改革的必要性[J].法学研究,1999(1):58-64.
- [30]陈岚.我国检警关系的反思和重构[J].中国法学,2009(6):112-115.
- [31]樊崇义,张中.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J].中州学刊,2015(1):56.
- [32]卞建林.论我国侦查程序中检警关系的优化——以制度的功能分析为中心[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5(3):65.
- [33]刘成高,蔡伟民.刑事诉讼中法检权力配置关系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6):80.
- [34]徐耀耀,曾光辉.坚持依法治国为主、以德治国为辅的治国方略[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5(6):27.

(责任编辑:余小江)